

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经济学意蕴

孙来斌

摘要: 马克思晚年并没有放弃《资本论》的创作,深化《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完善地租篇的写作,是他关注和研究俄国社会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提出的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内涵,是他以前经济思想的继续和深化。这些思想及其体现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晚年设想 非资本主义道路 经济学 理论价值

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不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设想(以下简称马克思晚年设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这一设想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有关研究论著不在少数。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集中在哲学、政治学(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上,马克思晚年设想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意蕴。马克思在晚年是否离开了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晚年设想论及到哪些经济学问题,它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经济学动因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会花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东方国家,这一研究同《资本论》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就是“转向说”。例如,美国著名学者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晚年“开始离开经济学、离开英国的工业问题、离开《资本论》的十九世纪的西欧世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到晚年,为了摆脱“炽热革命热情和殷切的革命期待在现实生活中都被无情地化为泡影了”的“思想困惑”,“转而去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研究。”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创作于不顾,孜孜不倦地从当时出版的人类学著作摘录了大量笔记,走向了人类学。

从表面看来,“转向说”颇有道理。但是,深究起来,却存在着偏颇。马克思在晚年加强了对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的研究,这是史实。但是,这一研究并非与《资本论》的创作无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资本论》创作的继续和深化。

《资本论》倾注了马克思的毕生心血。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仍然一如既往地倾心于《资本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便着手后几卷的写作与修改。

对于《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恩格斯曾经评价说:“马克思

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这一任务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完成。但是,剩余价值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实现以后并非被产业资本家独占,它必然要分成不同的范畴。“资本的一般运动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间,在商人、货币债权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分配。”因此,作为研究的继续和深化,《资本论》第一卷之后理所当然地要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要研究土地所有权和地租问题。这一点,马克思自己说得很清楚:“考察一下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里的任务总的来说是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考察这一点,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

研究土地所有权和地租问题,自然要解剖典型,进行具体分析,然后上升到理论一般。《资本论》所要研究的,不是土地所有权的所有历史形式,而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因此,除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确立的英国以外,马克思还特别注意研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才经历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为此,他尽力搜集和研究美国、德国、俄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有关材料。例如,1868年7月,马克思在致迈耶尔的信中说:“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1870年1月,马克思致信比利时工人活动家巴普,请求后者将有关比利时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农业的“基本著作书目告诉”自己,以便开展研究。1872年底,马克思致信俄国民粹派学者丹尼尔逊,请后者提供俄国的有关资料,并说:“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典型性。因为俄国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新

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制度正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濒临崩溃。将俄国的土地关系作为典型来研究,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地租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利于在同前资本主义地租的比较分析中揭示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此外,实行特殊赋税办法的俄国村社制也引起了马克思的特别兴趣——“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⑩

关于俄国土地关系在《资本论》地租篇研究中的典型地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有过分析。他说:“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⑪

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实现他的研究计划,除了第一国际事务对精力的牵扯、疾病的困扰以外,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马克思在1879年4月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⑫

马克思研究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他却收获了“副产品”,即他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当然,他对此问题的关注,仍然与《资本论》紧密相关。19世纪70年代,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度过了革命危机,开始了所谓和平的发展时期,并加紧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掠夺和渗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走出了西欧,开始向东方国家传播。当时的俄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如何,资本主义是不是俄国的必经之路,这是俄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犹如投向俄国思想界的一块巨石,激起了思想的千层浪花,赞成和反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人都竞相引证《资本论》,同样的内容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理解。其中,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公开发表的论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引证《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宣称:按照《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俄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为了澄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于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声明信。他反对人们机械地搬用《资本论》去认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指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

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根据其多年来对“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与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的研究,认为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是否要经历资本主义将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⑬他担心这封信会给刊登的刊物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因此并未将信寄出。由于俄国革命者未能及时了解马克思的态度,因此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争论仍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请教:“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⑭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表明了他的态度,从理论上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晚年研究俄国问题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深化《资本论》的研究,完善地租篇的写作。由于对俄国问题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当时要求马克思对俄国社会道路问题发表看法的时候,他能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科学设想,取得超出地租问题以外的新的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经济学内涵

马克思晚年设想涉及的主要文献有:《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即人类学笔记)、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及正式复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的序言。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较之从前有了一些新变化,他对经济形态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深化了他以前的经济学思想。

1. 扬弃“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亚细亚生产方式”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到晚年是否放弃了这一概念?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至今尚无定论。研究马克思晚年设想,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以上问题的理解。

从发生学上讲,“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基本特点的概括,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三位一体”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其后,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之指称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可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从东方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的经济

发展一般。

19世纪70年代,人类对史前社会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其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始社会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东方国家至今尚存的“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⑮。

由此,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但是,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采取的是扬弃而不是抛弃的态度,他放弃的是这个概念的名称,却按照历史的原貌保留了这一概念的特殊内涵,并用“农业公社”^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⑰等新概念来表示这种特殊内涵。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由以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⑱。由于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那里长期得以残存并在相当时期内占统治地位。

综合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时间序列看,它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出现于阶级社会的早期,是一切形式的剥削制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从空间序列看,它作为历史的“残迹”,是指在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的一种以村社制度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2. 提出新的“三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经济形态有过不同的表述,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五形态”理论和“三形态”理论。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五种经济形态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⑲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将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作为根据,提出了三种经济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⑳。

马克思晚年根据新的史料研究成果,又对社会经济形态作了新的理论表述。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借用地质学的术语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㉑“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

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㉒“次生形态及其带来的弊端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㉓。

按照马克思的新表述,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主要有:原生形态、次生形态、未来形态。这也是一种“三形态”,它不同于按照人的解放程度所提出的“三形态”,而主要基于所有制的性质来划分,概括了“公有 私有 公有”这样一个所有制形式的辩证否定演进序列。这种“三形态”与“五形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五形态”的浓缩。原生形态对应的是原始社会,未来形态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次生形态则对应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新的“三形态”理论,丰富了马克思的经济形态思想。

3. 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英、法等工业化国家为背景和解剖对象,运用哲学思辨和经济学分析的手段,探讨了西欧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那么,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一般情况也有过分析,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㉔。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凭借着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材料的深刻的经济学把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现状和前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

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绝对化的错误,马克思根据有关史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㉕具体到俄国而言,如果俄国政府继续推行破坏农村公社的做法,“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㉖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结论,暗含着俄国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俄国抓住特定的历史机遇,它将不必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尘,免遭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痛苦。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㉗。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㉘。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国,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同时包含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因素),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影响俄国社会的性质,这将由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不能先验地得出结论。但

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从内心倾向于公有制因素成长的可能,他满怀希望地设想: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能够取得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⑩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先后有两种思路:《资本论》提出的资本主义道路和晚年设想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反映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前者以西欧国家为典型,揭示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后者以俄国为典型,揭示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

三、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经济价值

除了上述方面以外,马克思晚年设想还蕴含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它在这些方面所体现出的思想火花和思考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资源。

1. 马克思晚年设想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兼容开辟了理论空间

马克思早先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俄国等落后国家,亚细亚生产方式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其一,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阶段;其二,它们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所拥有的多半是以手工劳动为特点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其三,它们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⑪

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虽无详尽的具体论述,但他的答案蕴含在晚年设想之中。设想提出,俄国在实现了以铲除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以后,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对内要消除“它的软弱性的根源”,即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⑫。这些论述,实际上蕴含着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开辟了空间。

由此可见,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行观点,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有其现实依据,而且在理论上决不是无源之水。认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晚年设想,有助于理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流,把握马克思晚年设想 - 列宁新经济政策 - 邓小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2. 马克思晚年设想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克思曾多次论述过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给无产阶级造成的痛苦,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陷入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⑬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驾驭这种异己的力量,并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基础上,“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以殖民制度为特征的早期世界市场出现而产生的,其历史影响具有二重性。在《资本论》及其续篇当中,马克思把全球化唯物史观置于反映资本运动客观辩证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体系的宏大背景和牢固基础之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及其最终被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⑮

在前述理论探索的基础之上,晚年马克思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作了具体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认为,俄国要想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在于“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⑯。“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⑰

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在联系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俄国应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他对那种不顾俄国国情,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肆意破坏农村公社的做法,给予了严厉谴责。针对俄国政府推行的地租改革,他说:“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⑱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待全球化不能采取拒斥的态度,而要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本土资源的优势,“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⑲,注意克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的未来是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坐等那一天的到来。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理论流派纷呈,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正确的国际战略,主动应对全球化浪潮,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晚年设想中获得启迪。

3. 马克思晚年设想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认真研究马克思晚年设想,有助于拓宽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理论视野。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已给予了充分肯定。例如,谭崇台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④。张培刚教授认为,“称得上真正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著作的,最早要算是马克思从1867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⑤。我们认为,除了《资本论》以外,马克思晚年设想也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

其一,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问题。马克思反对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照搬到俄国,认为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设想已经为中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并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重点。同时,它的理论价值在当代西方激进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中也得到了印证。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激进经济学中的“依附论”对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依附论”提出,落后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斯威齐等人提出,社会主义才是落后国家的真正出路。这些主张,从侧面映衬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当代价值。

其二,马克思关于“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分析,实际上提出了后发优势问题。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管理经验等来加快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经常提到的后发优势。马克思晚年设想其实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⑥

其三,马克思关于“跨越”发展的条件性分析,实际上论及了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马克思晚年设想提出,俄国要走一条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有俄国革命,以推翻专制政府;要有西方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以获得物质和资金上的帮助;要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要利用世界市场,以保持同外界的联系,等等。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论及到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内的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技术进步、政治体制、国外资源等等的关系问题。

此外,马克思晚年设想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要获得发展,必须消除“孤立性”,走出“与世隔绝的小天地”^⑦;要利用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的传统,实现“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要利用“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⑧;要解决“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⑨,等等。这些论述,实际上论及了农业改造与转型这个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

根本问题。

相对于《资本论》的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晚年设想关注的不再是一般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不仅应该在经济发展思想史中确立马克思晚年设想应有的地位,更要在促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中重视它的宝贵价值。

注释:

[美]诺曼·莱文:《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1)。

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载《光明日报》,1989-05-29。

吴波:《论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的动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3)。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557、340~342、765、762、342、340、774、765、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539、629~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549、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⑬《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中文版,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450、432、450、432、435~436、436、431、444、437、445、445、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⑩《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文版,117~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⑳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33、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⑳参见王东:《“晚年马克思”新解》,载《教学与研究》,1996(5)。

㉓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87、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㉕参见颜鹏飞:《经济全球化的四大经济学思潮》,见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56~5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㉗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28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㉘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646~64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J)